

張裕釗 著
王達敏 校點

張裕釗詩文集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裕釗 著
王達敏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張裕釗詩文集

袁行霈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裕釗詩文集/張裕釗著;王達敏校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0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 - 7 - 5325 - 4782 - 1

I. 張… II. ①張…②王… III. ①詩歌—作品集—中國—近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國—近代 IV. I215. 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45099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張裕釗詩文集

張裕釗 著

王達敏 校點

書名題簽 袁行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1.625 插頁 7 字數 445,000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 - 7 - 5325 - 4782 - 1

I · 1965 定價: 5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張裕釗像

濂亭文集卷一

書鄭氏易注後

武昌張裕釗廉卿



往者余嘗論卜筮人之書亡而易象亡故易不可見而昔人亦謂春秋以無魯史策書終不得盡觀聖人褒譏筆削之旨故是二經分離乖異卒不可通此學者之所深悼也烏乎春秋之不可知也已矣何也其義必附於事而事之存焉者寡也後之學者知其所知者而已其事之亡而不能盡知也慎闕其疑焉耳雖有聖人者作亦不可得而知之也至於易則又不然天地萬物之

光緒八年查氏木漸齋刊《濂亭文集》卷一書影

濂亭遺詩卷一

贈范鶴生吏部

鳴齋

武昌張裕釗廉卿

京華去楚三千里下走別君十五年回首風塵堪隕涕
驚看霜雪已盈顛生涯落拓餘孤棹知舊凋零半九泉
萬事欲從何處說且憑爛醉看江天

書感

諸公稔禍甯堪說四十年來歲月遷盡解藏身三窟固
豈知厝火一朝然萬事已逐江東逝孤憤欲回天左旋
梗概書生今已矣扁舟夢去五湖天

執事南仁先大人閣下初言幸得一面計早還數

日前至晉仰過此云

閣下將有天津之行其位然邪

大著二篇已妥綴數語於此以增其清

譽入李副介誅自而之正外無餘為之者

以於此體着身長獨撰吾書此一書為未

快意然略知刪潤則亦一篇絕奇文字矣

張裕釗致吳汝綸書信手迹

序 言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於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章氏叢書等，搜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人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前言

張裕釗在清季以古文焜耀於文壇。曾國藩、劉熙載皆許其文爲當世「海內第一」^(一)。吳汝綸說：「清代足與文章之事者，姚鼐、梅曾亮和曾國藩後，惟張裕釗而已」^(二)；「廉卿死，則《廣陵散》絕矣」^(三)。孫雄說：「裕釗之文，亦實足以傳世行遠」^(四)；近世除曾國藩外，「鮮足與裕釗抗手者」^(四)。

張裕釗的名山事業，實由曾國藩陶鑄而成。立雪曾門，使他由鄉隅之士一躍而爲國之精英。其學融通漢宋，以禮爲歸，預於清季學術主流；其感時憂國的吟咏，是多難之世最爲沉鬱的歌哭。其文繼軌桐城，又不爲所囿，雄奇而兼平淡，自成一家面目。而其勛績中尤爲不可磨滅者，乃是與吳汝綸聯袂創辟了綿延於清季、民國文壇的蓮池派。

張裕釗對文事至爲執著、虔敬。他自謂「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五)。張裕釗的嗜文，類如春蠶作繭，首先出於天性。他說：「人嘲春蠶自纏縛，蠶不作繭復不樂。」^(六)張裕釗的嗜文，

也源於其對千秋之名的強烈期待。他說：「人生一瞬耳，所爭乃千古」^{〔七〕}；「寂寞期身後」^{〔八〕}。文章若能垂世不磨，一切「窮通、得喪、愉戚、寒飢者溫飽者」^{〔九〕}，均非其所計。張裕釗的嗜文，尤在於他意識到文既可自娛，也可由之達於聖人之道，進窺天地之純。他說：「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俾睨乎塵埃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一〇〕}張裕釗之文終能別成一家，與其嗜之成癖絕相關聯。

張裕釗字方侯，又字廉卿；初號圃孫，又號濂亭，湖北武昌人^{〔一一〕}。生於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二十四（一八四六），鄉試獲雋。年二十八（一八五〇），任內閣中書；兩年後辭官南歸。此後，除出入曾國藩幕府外，先後主武昌勺庭書院、金陵鳳池書院、保定蓮池書院、武昌江漢書院和經心書院、襄陽鹿門書院講席。年七十（一八九二），為長子張後沆迎養於西安，并短暫客西安將軍榮祿之幕。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卒，享年七十二歲。將卒，自營生壙於終南山有宋大儒張載墓側，可知其志矣^{〔一二〕}。

（一）見知曾氏

張裕釗成學過程中的決定性事件，是他與曾國藩的遇合。曾國藩約已惟謹，事功赫奕，而且學識闕通，文章軒茂，其知人喜才，尤超軼群倫。張裕釗自初晤曾國藩見知（一八五〇），到曾氏過世（一八七二），始終備荷垂注。曾國藩的日記、書信，詳細記錄着他對張裕釗的勤教嚴繩、提携顧念。正是在曾國

藩的熏蒸下，張裕釗終成學界名家、文壇巨擘。

張裕釗初識曾國藩，即被激賞。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八月，張裕釗在京門應試國子監學正學錄。曾國藩時任禮部侍郎，為讀卷官，悅其文，拔之於稠人之中。待張裕釗來見，曾國藩即問：「子豈嘗習子固文耶？」^{〔二二〕}張裕釗自幼諳熟曾鞏之文，筆下不期然而有所流露。曾國藩敏銳地察知并鄭重道及，令張裕釗歡喜無極。同時，曾國藩特為張裕釗引聲朗誦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公墓誌銘》，「抑揚抗墮，聲斂侈無不中節，使文字精神意態盡出」；而張裕釗「言下頓悟，不待講說而明」，「自此研討王文，筆端日益精進」^{〔二四〕}。初見得寵，給張裕釗的烙印如此之深，以至於數十年後，他回念往事，仍心潮難平。他說：「憶昔平原入洛時，侍郎一見嘆權奇。」^{〔二五〕}又說：「湘鄉老眼賞神駿，一見識是渥窪姿。」^{〔二六〕}張裕釗初逢曾國藩，年已二十有八。他原本幽居鄉邑，父兄既非特出，投分無間的師友也多屬平常；雖幸領鄉薦，也不過熟於帖括之學而已。而他首度入京，一試即見賞於廟堂清要曾國藩，這給予他多少自信和光榮，無怪他對此銘感終生。

曾國藩激勵張裕釗修養心性，刻苦振拔，以期有成。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八月廿二日至九月八日，張裕釗謁見曾國藩。十餘日內，師弟子談文無虛日。離別時刻，張裕釗依依眷戀，曾國藩也「篤愛不忍舍去」^{〔二七〕}，并書手卷一幅相贈。這幅手卷的內容，為曾國藩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二月所作《五箴》。曾國藩撰寫《五箴》時，已經三十四歲。他自感時光荏苒，碌碌無成，痛自警誡。這《五箴》依次是：《立

志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恒箴》。文章語語斬釘截鐵，顯出作者意欲振勵之願。關於立志，他說：「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興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關於居敬，他說：「女之不莊，伐生戕性」；「馳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人則下女，天罰昭昭」。關於主靜，他說：「齋宿日觀，天鷄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辱！」關於謹言，他說：「巧語閑言，擾身攬神；道聽途說，貽羞於人。」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關於有恒，他說：「黍黍之增，久乃盈斗。」^{二〇}曾國藩手書自箴之言以贈，對張裕釗可謂期待殷殷。

曾國藩引領張裕釗在創作中棄柔弱而趨雄奇。張裕釗從游曾門期間，每有述作，必呈誨於曾國藩之前。曾國藩雖軍書旁午，每接張裕釗文，也必抽暇審閱評覽。張裕釗不在曾幕時，曾國藩與之函札往還，常常談學論文。張裕釗在曾幕時，曾國藩更幾乎無日不與之論學談文。一部曾國藩日記，滿是曾氏與張裕釗研論古文的記載。曾氏推崇「雄奇瑰瑋」^{二一}文境，他期冀張裕釗研習揚雄、韓愈之文，參以兩漢古賦，以救柔弱之短。咸豐九年（一八五九）三月十一日，他說：「足下爲古文，筆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論古文之途，有得於陽與剛之美者，有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畫然不謀。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柳宗元。陰柔者約得四家：曰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修、曾鞏。然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氣體近柔，望熟讀揚、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其短，何如？」^{二二}張裕釗謹承曾國藩之教，爲文很快就由柔弱一變而爲雄奇。

曾國藩學兼漢宋，對張裕釗深具影響。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一八四一—一八四三），曾國藩在邵懿辰、唐鑑等師友夾持下，建立了對程朱理學的信心^{〔二二〕}。對漢學考據，他本不以爲然。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正月十七日，他說：「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二三〕}但在學問成熟期，他的看法大異。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四月二十一日，他訓諭曾紀澤，若有志讀書，不可不一窺顧炎武、閻若璩、戴震、江永、錢大昕、秦蕙田、段玉裁、王念孫「數君子之門徑」^{〔二四〕}。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十二月，他自謂：「一宗宋儒，不廢漢學。」^{〔二五〕}就在曾國藩下此斷語前的九月八日，他與張裕釗有過一次「論國朝諸大儒優劣」^{〔二六〕}的談話，其論旨自當不出宗宋而不廢漢二端。張裕釗在《祭曾文正公文》中，稱美乃師「導達漢宋，藩決途夷」^{〔二七〕}，得其爲學神髓。張裕釗論學兼容漢宋，即是在曾氏學術觀籠罩下形成的。

曾國藩接引張裕釗進入清季最負盛名的學術群體。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二月，曾國藩兵起衡湘伊始，即招張裕釗入幕^{〔二八〕}；洪、楊敗後，又延其主江寧鳳池書院達十二年之久。咸、同之際，曾幕辟召皆一時英傑，文采風流，冠絕海內。桐城方宗誠和吳汝綸、江寧汪士鐸、儀徵劉毓崧、獨山莫友芝、遵義黎庶昌、南匯張文虎、海寧李善蘭和唐仁壽、德清戴望、寶應劉恭冕和成蓉鏡等，並以學術風采相尚；暇則常從曾國藩游覽宴集、雍容賦咏^{〔二九〕}。張裕釗與這個群體中的主要成員切磋琢磨，學問日進。

曾國藩對張裕釗獎飾紛綸。在咸豐九年（一八五九）至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之間，曾國藩時而稱譽張文「精進可畏」^{〔三〇〕}；時而又說：「廉卿近日好學不倦，作古文亦極精進，余門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

推此人」^(三〇)；時而因張文「日進無疆」而「至爲欣慰」^(三一)；時而喜其「學問又已大進」^(三二)。張裕釗作《答劉生書》，曾國藩評曰：「文入古甚深，而辭又足以達其所見，實已參透真消息。」^(三三)曾國藩褒獎張裕釗不絕口，爲其在曾幕內外，乃至整個學壇，贏得盛譽。

張裕釗一生學問，由曾國藩哺育而成。他在許多華章中，不遺餘力歌頌曾國藩的偉績；對其知遇之恩，更深致感激。在《贈方子白翊元》中，張裕釗把曾氏領袖的咸、同文壇與歐陽修主盟的嘉祐文壇相提并論，把包括自己在內的曾門諸子擬爲歐門蘇、曾；并「感懷知己」，不能自己^(三四)。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二月初四日，曾國藩病逝，張裕釗悲不自勝。其悼文曰：「矧我小子，靡所比似。薄陋滯拙，世之所棄。辱荷公知，區區文字。譬海納川，我乃涓澮。暇日請謁，公屢色喜。評權古今，往往移晷。矜我誨我，我礪我砥。翼我燾我，畀我無已……天下之慟，一身之私。哀來無端，涕隕如糜。公乎有知，其稔予悲。」^(三五)他對曾氏的矜誨、礪砥、翼燾，表達了沒世不忘之情。

（二）預流與憂憤

張裕釗的思想與清季世局緊密相關。在學術方面，他鎔鑄漢宋，以禮學爲歸，意欲經世，預於當時學術主流。在社會方面，面對亘古未有之變，他感時憂國的歌哭，是那個時代志士仁人所能發出的最強音。張裕釗儘管以文名世，但他終生所驅勉從事者，并非徒從文以求文，而固以學問植其根基^(三六)。張

裕釗爲學首重宋學。其子後沆、後澹說：「先嚴於學無所不窺，而以宋儒理學爲本。」^{〔三七〕}張裕釗認爲，古聖之旨因程、朱而明，後世學者因程、朱而知所趨。他說：「自有宋程、朱諸儒倡明道學，古昔聖人所以覺世牖民之意，昭然大明於世，人乃始皆曉然於學者所以學爲仁義也。爲功於聖人，有裨於天下後世，豈不大哉！」^{〔三八〕}張裕釗理學素養湛深，並能力踐其學，有儒者氣象^{〔三九〕}。他對信奉宋學的學人也深致敬意^{〔四〇〕}。

張裕釗爲學亦不廢漢學。他認爲，漢代儒者在秦火之後，興亡繼絕，精深閱博，得洙泗微言大義，「信可謂卓然不磨者」^{〔四一〕}。張裕釗尤欽敬當朝紹緒漢代學術的學者研經之功。他說：「自康、雍、乾、嘉以來，經學號爲極盛，非獨遠軼前明，抑亦有唐而後所未有也。」^{〔四二〕}漢學家治經強調由聲音、文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張裕釗對此頗表認同。他說：「六書之旨，象形、象事、會意而外，形聲、轉注、假借三者，其本皆原由於聲音。是故必明乎古音，而後訓詁明；訓詁明，而後六經之說可得而知。」^{〔四三〕}張裕釗稱譽清代漢學的先導陳第「卓爲百代之先覺」^{〔四四〕}；對自己的好友、漢學家莫友芝的成就也甚爲推重^{〔四五〕}。張裕釗不以漢學名家，但也精於此道。他所校讎的湖北江南書局官書，「人爭購致，比之鴻都石經」^{〔四六〕}。他又撰有《左氏服賈注考證》、《今文尚書考證》等專門漢學著作。

張裕釗對宋學、漢學之弊有深刻覺悟。他認爲，宋學末流，爲學狹陋，「不能博文約禮，究極乎本末終始、廣大精微之致」^{〔四七〕}；束書不觀，拮据拾諸朽腐熟爛之言，妄自著書，「不知其書乃爲有識者之所深鄙

棄絕而不欲觀」〔四八〕；「言行相悖，「瘡痍以冒粟，身桀而口堯」〔四九〕；「摒棄考證，「專從事於義理」〔五〇〕。關於當朝漢學之短，張裕釗認為，其「患在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而反詆訾宋賢，自立標幟，號曰漢學。天下承風相師，爲賢君子病焉」〔五一〕。

張裕釗由於洞悉漢、宋優劣，因而力主在尊奉宋學的前提下，會通漢、宋。他認爲，宋學重義理，側重闡發聖人之道；漢學重考證，有助於通向聖人之道。二者固有本末、精粗、重輕之別，但治學中不容厚此薄彼。因爲聖人之道寓於經，欲明經中之道，不循考證之途，就無由得之。只有漢與宋合，道與器備，方能得天下之理。他說：「夫學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之以考證，雖其說甚美，而訓詁制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焉？故裕釗常以爲，道與器相備，而後天下之理得。至於本末、精粗、輕重之數，是不待口說之辨而明者也。」〔五二〕由於力主漢、宋兼容，張裕釗對爲學不設漢、宋壁壘的顧炎武、王夫之至爲服膺。他說：「二人初無此等門戶之見，所以高出以後諸儒。大抵亭林、船山於許、鄭、杜、馬、程、朱之書，無所不究切，兼綜考據、義理之長，精深宏博邈焉。」〔五三〕

張裕釗把禮學視爲會通漢、宋的佳途，經世致用的根本。在經學中，張裕釗最重禮學。他說自己「晚學今耽小戴經」〔五四〕。他認爲，禮關乎修己、治人：「蓋自人之一身，耳目形體、飲食男女之事，推及乎天下國家，朝野上下，冠昏喪祭射御食饗之經，至於班朝治軍，莅官行法，未有一事而不由乎禮者也。」有禮則「身得其安」、「家得其序」、「天下得其理」，禮失則「禍敗從之」。由於禮如此重要，因此，「博之大儒，若